

文章编号: 1009-6000(2012)07-0009-06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我国多元城镇化战略模式研究》(编号: 08&ZD045)

作者简介: 陈宇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研究方向: 城市社会学。

我国快速城镇化时期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对策评价与思考

Evaluation and Thoughts on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in Chinese Large Cities in the Fast Urbanization Period

陈宇琳

CHEN Yu-lin

摘要:

国内学者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学等多个学科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探讨并未形成统一意见,有必要对大城市人口规模能不能控制、该不该控制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本文首先从行政控制、产业置换和空间疏导3个方面对当前我国大城市采取的主要人口调控对策进行梳理,发现并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进而从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视角对大城市人口规模应不应该控制进行追问,发现理论层面并不对大城市人口规模构成绝对约束。最后,回归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提出人口规模调控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众多手段之一、城乡差距是人口规模调控能否实现的关键,以及构建人口发展的“环境-经济-公正”分析框架等建议,为政府制定人口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大城市; 人口规模; 调控; 政策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current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of Chinese large cities from 3 perspectives of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ndustry replacement and space programming. Very few policies have achieved expected results so far. Further, the paper takes views of ecology, economy and sociology to examine whether the population of large cities should be indeed controlled. The conclusion is not necessary, and to some extent theories even prefer further population growth. Finally, based on the view of large city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are just one of the means to achiev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im, the urban-rural gap is crucial for the population control effect, and to construct the “Environment-Economy-Equity” framework to help city governments design appropriate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Key words: large cities;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1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根据《201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界定的市区非农业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标准,在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大城市的个数从2005

年的221个增加到2009年的234个,4年间增加了13个^[1]。大城市不仅数量增长快,城市内部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亦十分迅猛,人口规模突破规划目标的现象屡屡出现。根据六普统计数据,2010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301.91万人,大大超过“十一五”



规划中提出的 2010 年常住人口 1900 万人的目标；2010 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 1961.2 万人，提前 10 年突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中确定的 2020 年常住人口 1800 万人的目标。在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大城市病”也开始爆发，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短缺等问题日益突出，大城市的宜居性受到很大挑战。

西方国家城市化经验显示，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不可避免，但庞大的人口又是引发“大城市病”的一个重要根源，那么，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究竟能不能控制？如果不能控制，又是什么原因？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国内学者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学等多个学科进行了探讨，但从研究结果来看，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大城市人口规模能不能控制、该不该控制等问题系统分析。本文将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对当前采取的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策略进行梳理，并分析现状问题的根源，从而提出大城市人口发展的分析框架。

2 现状分析：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策略及其评价

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两部分。流动人口的迁入，即机械增长是当前我国快速城镇化时期大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以北京、上海和天津为例，三市六普数据中外来人口数量占常住人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35.9%、39.0% 和 23.1%，大大高于五普数据中的 18.9%、20.7% 和 8.7%。流动人口中又以乡—城流动为主，2010 年，在

我国 2.21 亿流动人口中，农业户口占 86.7%，远高于非农业户口 13.3% 的比重^[2]。针对流动人口大规模快速流入城市的状况，我国很多大城市采取了多方面的人口调控策略，概括而言，主要包括行政控制、产业置换和空间疏导 3 种类型，分别分析如下：

2.1 行政控制策略

行政控制策略主要是通过设置门槛控制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从而达到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目的。行政控制侧重从人口总量上直接对流动人口进城进行控制。我国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实行的都是“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在改革开放以前，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对策是比较有效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放开，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涌向城市，一系列城市人口控制措施随之出台，直到 21 世纪初，十六大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方针，以及随后颁布了一系列降低农民进城门槛的方针政策，国家层面上对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才逐步放开。尽管如此，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调控一直是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据相关研究统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仅北京市针对流动人口就出台了 30 多部法律法规^[3]。从具体措施来看，对于户籍制度，上海市自 2004 年起就对非本市生源高校毕业生采取“打分制”择优落户；北京市 2011 年区县“引进控制指标”大幅缩减，一些区的进京指标甚至不到去年的一半^[4]。对于住房，中央近期颁布的一系列住房限购措施，对是否持有本地户口实行差异化的购房政策，这在打击炒房团的同时，也对控制流动人口进入大城市起

到一定限制作用。

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限制措施可谓对流动人口形成“围攻”之势，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对控制流动人口进城的效果并不佳，难以抑制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究其原因，在市场条件下，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是：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到价格高的地方，从我国当前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存在的差距来看，农民流入城市不可避免还将持续一段不短的时间^[5]。行政控制对策虽然会在短期内发挥一些作用，但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人是流动的，这个区限制，可以去那个区，这个城市进不了，可以换一个城市，而且很多被限制的资源可以通过替代品替代，如北京市实行摇号购车后，出租车牌的业务随即发展起来，导致门槛形同虚设。而政策制度总有不完善的地方，管理过程也可能存在漏洞。因此，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中，运用行政手段对大城市人口进行调控很难奏效。

不仅如此，在我国大城市的现实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核心指标，人口规模增加对城市还有很多“潜在”功能。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到配套用地规模的大小，以及根据人口规模界定的城市等级所能获得的政治资源的多少。因此，不少地方政府都把做大人口规模视为地方政府圈地的手段。在这种观念下，生态格局是否合理可以再商榷，城市能否有效运转是多年以后的事情，只要有了足够大的人口规模，就能获得更多的土地指标，而相应的土地财政的收益和大搞建设的政绩也就能随之而来。一方面要对人口规模进行调控，一方面又

希望“做大人口规模”，这就是当前城市规划实践的陷阱，城市如此规划，人口调控怎能奏效？

2.2 产业置换策略

所谓产业置换策略，主要是指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企业进城的门槛，让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减少对流动人口总量的需求^[6]。产业置换侧重通过调节人口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等素质）间接实现对流动人口规模调控的目的。例如，新加坡为了防止大量马来西亚人流入，通过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成功遏制低端产业发展带来的人口大量聚集^[7]。国内很多大城市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城市发展规划中探索以产业置换控制流动人口增长的方式。广东省在2008年颁布《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广东省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以减少珠三角地区的人口数量。北京市在2011年初开始推广顺义“以业控人”模式，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17类业态严格审批，提高行业准入标准^[8]。

对于国内产业置换策略对人口控制的效果，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初期效果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在流动人口的就业领域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城市人口增长衍生出来的服务业，并且这些产业对就业的需求增长极为迅速。例如，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信息，在北京市2011年前3季度劳动力市场中位居“需求大于供给”前10位的职业主要集中在推销

展销、餐厅服务员、厨工、饭店服务人员和治安保卫人员等“低端”行业^[9]。

2.3 空间疏导策略

空间疏导策略是指在城市范围或区域范围内，通过调整产业布局，削减中心区人口规模，引导人口在全市以及更大的区域范围合理分布。空间疏导侧重通过调节人口的空间结构从而间接达到对人口规模调控的目标。当前中国大城市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中心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并且随着城市单中心发展，中心城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如果将大城市核心区的功能疏解，在周边形成组团或新型城市，利用市场规律，就可以引导人口向大城市周边聚集，从而缓解中心城区的压力，或进一步向周边城市疏解，以减少城市人口的总量^[10]。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伦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都采取了这一措施，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以伦敦为例，伦敦通过建设新城，中心城区人口从1960年代的800万降到1983年的650万^[1]。

我国很多大城市都曾尝试对城市人口进行空间疏导。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就开始引导市区产业向郊区疏解，在郊区构建多中心工业区组团^[11]。但根据左学金等对人口分布、企业布局、交通规划、城市用地和住宅建设等要素的分析认为，上海目前并没有打破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12]。北京市曾在2004年《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中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空间布局思路，但是从目前情况看，仍然没有摆脱“摊大饼”的发展态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动力不足，没有好的产业带动，也就很难发挥空间疏导的实

际效果；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地区并不是由于产业发展不足，而是因为中心城区的吸引力要远大于周边，尤其是在教育、医疗、文化和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方面，城市内部的不平衡是导致中心城区的核心功能难以向外搬迁的主要原因之一。

3 理论追问：大城市人口规模应不应该控制

从上文分析的3种人口规模调控策略来看，目前对我国大城市人口控制的效果并不如人意。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措施的失效？也许更有必要回到命题的源头进行追问：大城市人口规模究竟应不应该控制？大城市到底有没有合理的城市人口规模？具体可以从生态、经济和社会等视角进行分析。

3.1 环境承载力视角

在环境承载力研究中有“适度人口规模”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是从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城市环境承载力的计算，提出相应的适度人口规模。然而，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没有单一的适度人口规模。首先，由于参照指标和算法的不同，以及对远景的不同预期，对适度人口规模的估算存在很大差异。以上海为例，上海水务局根据居民用水和工业用水估算，认为2015年上海城市适度人口是1820～1870万，上海房屋土地管理局根据建设用地和房屋容积率估算，提出2010年上海城市人口适度规模为1585～2040万^[13]，这两个适度人口规模之间就存在很大差异。其次，由于科学技术、城市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变化，适度人口规模是动态发展



的。任远通过对 EFL 模型（环境、功能、区位）的分析认为，随着环境、功能和区位的变化，适度人口规模也会随之变化，没有绝对的适度人口规模^[14]。对于适度人口规模，笔者十分赞同彭希哲和任远的观点：“适度人口规模只具有远期目标的参考作用和特定城市生活方式的借鉴作用，是考虑了若干有限因素并基于我们目前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的规划结果”^[13]。一方面，适度人口规模确实是关乎环境承载力和城市舒适度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诊断当前城市问题、引导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另一方面，适度人口规模是动态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城市的承载力可以有所提高，特定承载力之下的宜居程度也会有所改善。因此，我们既要重视适度人口规模，但也无需过分恪守某个数值节点。

当然，不同城市由于环境本底不同，对于适度人口规模的敏感度是不同的。对于上海，多数专家认为环境不是上海发展的限制条件，上海的人口可以继续增长，以保持经济的活力。而北京则不同，由于受到水资源和地形条件的影响，普遍观点都认为北京应该控制人口，以保持地区的生态可持续性。

3.2 经济发展视角

对于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和相互关系，定性研究主要遵循“产业—人口—消费—产业—人口”的思路，即产业由于聚集效应不断向城市聚集，必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口来到城市，而随着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又会带来消费的扩大和产业的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简而言之，就是产业发展与人口增加相辅

相成。由于我国多数大城市当前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依靠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生产份额相对较低，因此必须依靠劳动力的投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15]。而如果强行控制人口规模，将制约大城市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口结构角度出发，认为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状况下，可以利用我国人口结构的地区差异“削峰填谷”，利用流动人口解决大城市的劳动力短缺问题^[16]。在定量研究中，王桂新从经济增长持续、生态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和地区财政增强等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口规模增长和城市发展持续性的关系认为，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总体上是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人口规模增长是促进我国大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17]。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通过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城市的比较，认为中国大城市在人口密度、人口规模等多方面仍有增长的空间。如 2009 年东京都和东京都市圈（包括东京都和埼玉、千叶、神奈川三县）的常住人口分别为 1286.8 万和 3508 万，人口密度分别是北京市的 5.7 倍和 2.5 倍，因此北京的城市人口还有发展的潜力^[18]。左学金等在大都市创新与人口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中认为，稳定增长的人口规模是实现创新和保持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还有明显的差距^[19]。

3.3 社会制度视角

城市经济学中的“最优人口规模”理论认为，在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每增加一个人对城市带来的正效益大于对城市的负效益，但当人口规模达

到某个临界点时，再新增一个人所产生的负效益将会大于正效益，降低城市的运行效率。这个临界点即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在聚集经济促使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完全的市场机制可以使大城市人口维持在最优人口规模。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大城市，由于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人口流动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城乡差距也不大，因此能够实现人口规模的自我调节。

但是中国有所不同。由于市场机制并不完善，中国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发展情况无法用最优人口规模判断。对此，从宏观政治体制方面，王桂新认为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的根源是集权的政治体制，因为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大城市都会得“大城市病”，但在中国，集权体制使得社会资源的分配趋于更加垄断，其结果，一是资源向大城市集中，二是资源向政府机构所在地或 CBD 地区集中，这就不可避免使大城市人口向更大规模发展。因此，如果不改革集权体制、打破城乡壁垒，大城市人口规模就无法控制^[18]。从微观市场机制方面，范红忠对大城市农民工、大城市大学应届毕业生和大城市居民 3 个劳动力市场的流动特征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农民工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关性、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城市病”的不敏感性，以及大城市居民中劳动人口较高的迁移成本，导致了厂商和工人在承受聚集外部性上的非对称性，因而使得生产与人口在大城市过度集中^[20]。因此可以看出，中国在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下，城市并不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大城市的人口会进一步增加，数量会大大超过最

优人口规模。

综上,通过对大城市人口规模应不应该控制这一命题的追问可以看出:从环境承载力的角度看,由于参照指标和算法的不同以及对远景的不同预期,适度人口规模有多种结果,并且这个数值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适度人口规模只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不论是从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中国当前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都普遍认为中国目前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有必要进一步增加;从市场机制的角度看,只有在完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城市才有最优人口规模,但中国并不具备完全的市场环境,在当前宏观集权政治体制和微观厂商和工人承受外部性并不对称的情况下,人口只会进一步向大城市聚集。由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国内现有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策略难以落实、难以奏效,出现“行政控不住、产业带不动、空间疏不走”的局面。

4 对大城市发展模式的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通过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失效的理论原因分析可以看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口问题本身,而需要对更深层次的大城市发展模式进行思考,笔者尝试对大城市人口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4.1 人口规模调控不是目标,只是手段

讨论大城市人口的适度规模及其调控对策,根本目的是为了探讨在大城市这一特定的人居环境中如何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而调控人口规模只是实现目标的众多手段之一。因此,如果大城市不明确自己的发展目标,就难以确定人口规模调控的战略方向

和技术路径,评价调控结果是否有效也就无从谈起。

前文理论追问中所分析的环境、经济和社会3个视角,也正代表了大城市发展的3种目标取向。我国当前大多数大城市的发展都是经济导向的,高GDP、高城镇化率是很多大城市发展的目标之一,在这种模式下,人口规模的增长难以避免。如果为了实现环境最优,则需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不论是在人口总量的控制还是在人口空间的分布上都会有更明确的控制和引导措施,以实现宜居的目标。如果为了实现社会最优,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然伴随着集权的消解,要让更多市场的力量参与城市的建设发展,并且要花大力气弥补过去长期欠账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不论大城市选择什么发展目标(宜居生态,经济繁荣,公正合理,抑或兼而有之),一旦确定,就应当准备好接受与这种模式相伴随的各种问题,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或是自相矛盾、相互推诿。因此,我们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发展模式的研究上,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人口规模调控问题本身的争论不休。中国疆域广阔,不同地区的城市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积极探寻适合本地的发展方式,并且正确认识可能存在的问题,才可能更为积极地应对人口规模失控问题。

4.2 城乡差距是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能否实现的关键

当今在各大报纸上讨论“大城市病”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细细想来,如果把“大城市病”和“乡村病”比起来,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在广大的乡村地区,由于农业人口外

流和农田被挤占,农业经济结构遭到很大破坏,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更是长期短缺,因此,与“乡村病”结构性残缺的病症相比,“大城市病”只算得上是系统内部的局部失调。即使大城市人口规模大大超过最优人口规模,城市与乡村相比,其优势还是十分明显的,对于从农村来的流动人口而言,两害相较取其轻,依然会选择大城市,而且外来流动人口对于大城市病往往具有更大的容忍度。2000年以来,很多城市政府逐步将流动人口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范围,放宽流动人口准入制度,完善流动人口服务体系,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从目前的实施情况看,不考虑乡村地区的、或是在特定区域的不完全供给,只会增加大城市的吸引力,从而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加速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因此,我们如果只专注于“大城市病”的解决,而不考虑更大范围的城乡统筹,那么,由于人口规模过大引发的大城市病就无法避免。

世界其它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也都遇到了由于人口过度聚集导致的诸多城市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欧美发达国家曾通过城乡互动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后期得到缓解甚至消除。这种自我调节机制以自由的市场环境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有赖于农村产业的充分发展和乡村生活质量的提高,使城市化过程呈现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反观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制度和政府主导的快速城镇化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因此,我国大城市在应对人口规模过大问题上的自我调节能力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不足。

经典的推拉理论认为城镇化的根



本动力来自于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共同作用^[5]。一味地“城市向农村要土地”、“城市向农村要人才”，只会使拉力和推力同时进一步加强，造成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失效。因此，根本出路在于促进城乡统筹，一方面要缩小城乡在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发扬农村在自然景观和传统文化方面的特色，减弱农村的“推力”，甚至转“推力”为“拉力”；另一方面，应当推动城乡一体的市场环境的构建，建立健全包括就业、住房、社保等多方面的城乡统筹制度。

4.3 构建人口发展的“环境-经济-公正”分析框架

那么，大城市人口规模具体应该如何调控？虽然本文重点研究的是人口规模，但人口问题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问题，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布局等多种属性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为了更好地分析人口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笔者借用“3E”概念（Economy（经济）、Environment（环境）、Equity（公正）），提出大城市人口发展的“环境-经济-公正”分析框架（图1）。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的不同属性对不同城市发展目标的敏感度是

不同的：对于环境，人口的“规模”属性对环境的影响比较显著，过大的人口规模可能引发水和土地等资源紧缺以及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并且不同空间层次的人口规模所呈现的环境问题可能会有所不同。对于经济，人口的“结构”属性影响更大，不合理的人口结构可能引发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短缺和老龄化等问题。对于公正，人口的“布局”属性影响更为显著，这里所说的布局，不仅包括城市内部资源的合理分布，也包括城乡之间资源的合理分配，只有赋予空间均等的服务，城市才有可能实现效率最优。当然，人口的各种属性是合为一体的，环境、经济和公正3个方面也是相互作用、动态联系的，基于人口发展的“环境-经济-公正”研究思路，可以为实现大城市特定的发展目标提供整体联系的分析框架。

5 结论

我国自1990年代进入快速城镇化时期以来，流动人口大规模快速向大城市聚集对大城市的空间、环境和各种社会资源提出了巨大挑战。很多大城市都将流动人口规模调控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学者也围绕人口规模是否应该调控以及如何调控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但从研究结果来看，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多局限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或城市规划学等某一特定的视角，单个角度言之有理，综合起来却很难让人信服，或多局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落实到现实则往往事与愿违。针对现状研究的不足，本文尝试采用多学科交叉、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将人口规模调控嵌入更为广阔的城市发

展的综合背景，对人口规模调控失效的理论和现实原因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对于人口规模而言，人口规模调控只是城市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众多手段之一，在目前以经济为导向的发展目标下，不论是从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中国当前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都要求大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增加，而人多才能地广的不健康的城市规划观念则进一步加剧了大城市对人口规模增长的现实需求，为此，我们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发展模式的研究上，并保证城市发展目标与人口调控手段的一致性。对于人口布局而言，在我国现有政治体制下，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是导致空间疏导策略失效的一个主要原因，空间发展的不公正可能成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比人口数量众多更为严峻的挑战，为此，我们应当特别关注城乡的统筹发展，而不是继续将各种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大城市或者CBD等区域集中。对于人口结构而言，大量劳动力失业与民工荒并存的现状，反映出当前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的问题，为此，我们应当加强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促进我国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当然，中国的人口问题十分复杂，中国城镇化的道路也十分特殊，本文只是进行了初步研究，还需要立足中国现实进行更多的实践探索和实证研究，以启发以人为本的城乡发展新思路。

（致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对本文写作提出了宝贵建议，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2006 年

（下转 2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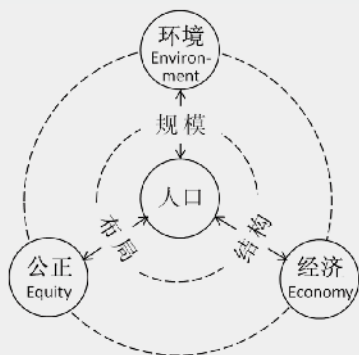


图1 人口发展的“环境-经济-公正”分析框架

(上接 14 页)

国城市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2]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2011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1.

[3] 段成荣. 从无序到有序: 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的思考[J]. 人口研究, 2011, (1): 38-41.

[4] 王红茹. 北京到底该装多少人[EB/OL]. 中国经济周刊, 2011-4-26.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4/26/c_121349988.htm

[5] 李强.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07-309.

[6] 北京决策研究基地课题组. 调控北京人口规模的有效途径[J]. 前线, 2007, (2): 40-02.

[7] 丁金宏. 论城市爆炸与人口调控[J]. 人口研究, 2011, (1): 33-38.

[8] 黄润龙. “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之浅

见[J]. 人口研究, 2011, (1): 29-33.

[9] 小百货等 17 业态严格准入北京市场[EB/OL]. 财经网, 2011-1-4. <http://www.caijing.com.cn/2011-01-04/110643825.html>

[10] 2011 年一、二、三季度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 2011-11-11. <http://www.bjld.gov.cn/xwzx/gqgx/>

[11] 吴群刚. 北京市人口规模现状与调控[J]. 城市问题, 2009, (4): 2-5.

[12] 叶立梅. 北京城市人口规模及其调控思路[J]. 前线, 2001, (10): 40-42.

[13] 张善余. 产业调整与上海城市人口再分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7): 85-90.

[14] 左学金, 权衡, 王红霞. 上海城市空间要素均衡配置的理论 with 实证研究[J]. 社会科学, 2006, (1): 5-16.

[15] 彭希哲, 任远. 人口因素与城市综合竞争力——对上海城市发展的一项研究[J]. 中

国人口科学, 2002, (6): 33-39.

[16] 任远. 城市生态学视野下的动态适度人口规模——兼论上海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5, (1): 22-28.

[17] 杜午禄. 对北京城市人口规模问题的再探索[J]. 人口研究, 1992, (1): 11-15.

[18] 翟振武. 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J]. 人口研究, 2001, (5): 1-7.

[19] 王桂新. 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5): 48-57.

[20] 王桂新. 我国大城市病及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的治本之道——兼谈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控制[J]. 探索与争鸣, 2011, (7): 50-53.

[21] 左学金, 王红霞. 大都市创新与人口发展的国际比较——以纽约、东京、伦敦、上海为案例的研究[J]. 社会科学, 2009, (2): 44-52.

[22] 范红忠. 我国大城市生产和人口过度集中的原因分析[J]. 城市问题, 2009, (11): 2-7.